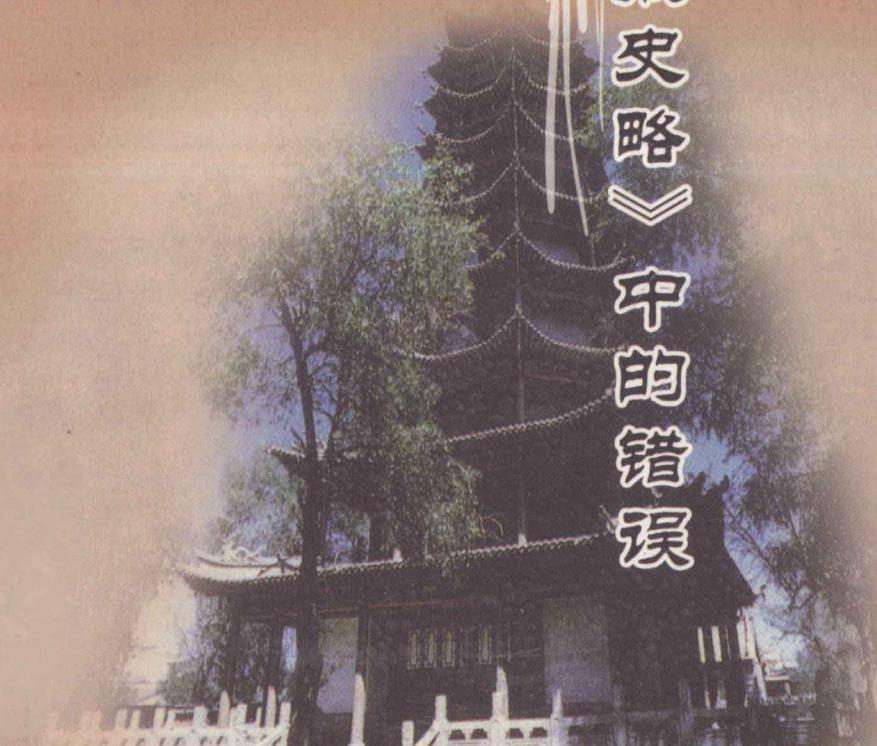




兼论

答方步和书

《张掖史略》中的错误



徐万和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# 答方步和书

——兼论方步和《张掖史略》中的错误——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答方步和书——兼论方步和《张掖史略》中的错误/徐万和著 .—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05.7

(文史集丛/智杰主编)

ISBN 7 - 5034 - 1648 - 3

I . 答 … II . 徐 … III . 论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60162 号

---

责任编辑：杨玉文 封面设计：牟方敏

---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

印 刷：北京通县永乐印刷厂 邮编：101117

装 订：北京通县永乐印刷厂 邮编：101117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：880×1230 32 开本

印 张：4.25 字数：88 千字

印 数：5000 册

版 次：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：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总 定 价：210 元

定 价：21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，工厂负责退换。

## 前 言

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，我是在张掖的文史工作岗位上度过的。由于有地、市党政领导的正确领导，上级业务部门的亲切关怀，文友和同志们的帮助砥砺，除完成分担的编写任务外，还依据手头掌握的资料，撰写了一些歌颂故园（张掖兼及河西有关地区）风土民情、歌颂祖国壮丽山河、歌颂历代杰出人物、歌颂中华先进文化的小文章，相继被省、地有关报刊录用，个别的还受到有关部门的表彰奖励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依旧认为自己学短识浅，理论修养和文字功力均较欠缺，不能和有水平有成就的同志相比，距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言”的“家”，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，因而也没有出个人专集的奢望。

然而却应了“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下跌”的俗语。河西学院占了便易卖乖的方步和教授，利用地委领导和省文化出版社支持出版《张掖史略》之机，打着开展“学术讨论”的幌子，在书后附上《浑

邪王归汉年代问题讨论》和《读徐万和先生的“辩证”(辨正)》简称《讨论》和《辨正》(下同),对我进行诽谤攻击。一个大学教授借领导支持出书攻击一个普通文史工作者,本身就是一大奇闻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,会认为是我徐万和的过错,否则教授不会口诛笔伐。加之教授先生用的又是公开撒谎、偷梁换柱、颠倒黑白、混淆是非等手法,人们就更会信以为真。

方步和对我进行诽谤、攻击和诬陷的同时,又在《张掖史略·〈关于伏羲生张掖的传说〉、〈月氏的畜牧和农业〉、〈商业贸易〉、〈农民起义〉》等章节中,用掐头去尾、断章取意、主观臆断、胡吹冒撂等手法,对《甘镇志》、《甘州府志》、《新修张掖县志》中的记述,进行随心所欲地歪曲和篡改,将“史略”写成“史论”、“史辩”、“史吹”、“史骂”,肆意歪曲篡改张掖(含河西)的历史,给支持出版《张掖史略》的领导丢人,给张掖抹黑。更为恶劣的是在〈农民起义〉一节中,对张掖已经作古的文人马曦瑞、袁辅臣、施生民进行“鞭尸”式的诽谤、攻击,诬蔑他们是:“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(有的是被杀的对象),为维护本地主阶级的利益,发泄对农民起义的仇恨”等等。请问方先生:马曦瑞、袁辅臣、施生民和我徐万和,哪个是“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文

人?”哪个“是被杀的对象?”哪个又是所谓的“地主阶级?”倒是有钱上初中、高中、大学的方步和教授是哪个阶级? 又从哪里获得利用出书诽谤攻击他人的权力?!!

为维护张掖和河西的光辉历史不被歪曲篡改,原地委领导的崇高威望不被损伤,张掖著名文人的荣誉和我本人不被诽谤、攻击和诬陷,特依据孔夫子:“来而不往,非礼也”和毛主席:“笔墨官司,有比无好”的教导,拟接受方步和开展“学术讨论”的挑战。用一年多的时间,将我近年所写的文稿整理打印,分“人物足迹”、“军政大事”、“经济活动”、“文化教育”、“传说故事”等栏目,编成《漫话金张掖》一书。同时依照方步和的做法,将《假学术讨论之名行诽谤攻击之实》、《从〈张掖史话〉出版 看所谓“教授”的嘴脸》、《霸占农民成果 难逃法制罪责》、《专制杀人的吹鼓手 民主法治的活对头》、《一部错误百出、给张掖抹黑的〈史略〉》等答辩文章附于书后,于2004年3月呈送市委和学院领导审阅处置,很快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就将我招去,除向我传达原地委书记、现省人大内法委黄主任“妥善处理”的指示,还要我提出处理要求,我听后既高兴又感激,当即送上一点请求,等候领导的“妥善处理”。不料月余后得到的竟是充当方

步和代理人的张中式扬言的“控告”，我非常生气，感到是再次受到方步和一伙的愚弄和欺辱。经再次思考：确定将送审的《漫话金张掖》书稿搁置起来，另将受到方步和、张中式攻击诽谤的《浑邪王归汉年代辨正》一文，以及方步和附于《张掖史略》后的“讨论”、“辨正”和我的答辩文章单独印刷成《答方步和书—兼论方步和〈张掖史略〉中的错误》出版，除请专家、学者和社会人士审阅公议外，并报请省委、省人大和省人民政府的领导审阅处置。

# 目 录

前 言 .....	( 1 )
<b>一、浑邪王归汉年代辨正(徐万和) .....</b>	<b>( 1 )</b>
附件 1:《浑邪王归汉年代问题讨论》(方步和) .....	(12)
附件 2:《读徐万和先生的辨证(辨正)》(方步和) .....	(14)
<b>二、假学术讨论之名 行诽谤攻击之实 .....</b>	<b>(30)</b>
答方步和书之一(徐万和) .....	(30)
<b>三、从《张掖史话》出版 看所谓“教授”的嘴脸 .....</b>	<b>(39)</b>
答方步和书之二(徐万和) .....	(39)
附件:《张掖仙姑的历史意义》(方步和) .....	(45)
<b>四、霸占农民成果 难逃法制罪责 .....</b>	<b>(53)</b>
答方步和书之三(徐万和) .....	(53)
附件:《第十二节 农民起义》(方步和) .....	(59)
<b>五、专制杀人的吹鼓手 民主法治的活对头 .....</b>	<b>(74)</b>
论方步和《张掖史略》中的错误(徐万和) .....	(74)
附件 1:相关说明 .....	(96)
附件 2:《徐氏家谱》中的相关篇节 .....	(97)
<b>六、一部错讹百出、给张掖抹黑的《史略》 .....</b>	<b>(100)</b>
再论方步和《张掖史略》中的错误(徐万和) .....	(100)

## 浑邪王归汉年代辨正

按：此文由徐万和同另一位同志合作写成，原载于兰州大学编辑出版的《西北史地》1996年第4期，除赢得好评外也招来方步和与张中式先生的诽谤、攻击。现特收录于此，恭请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审议并开展讨论。

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归汉，千里河西纳入西汉版图，标志着强大的匈奴帝国由盛而衰，最终趋向分裂、融合的开始；也标志着雄才大略而又贪婪暴戾的汉武帝立足河西、经营西域、完成空前统一大业的开始。这确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。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中记叙浑邪王归汉的时序时说：

“其秋，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，数为汉所破，亡数万人，欲召诛之。浑邪王与休屠王恐，谋降汉。”

千百年来，史学界一直把这里的“其秋”，看作是元狩二年的秋季，似乎已成了定论。近年来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，我们多次阅读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、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、《大宛列传》和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、《匈奴传》、《卫青霍去病传》及其他有关著述，发现浑邪王归汉的年代不可能是元狩二年，而是元狩三年；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和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中记述的“其秋”，也不是元狩二年秋季，而是元狩三年秋季。同时还发现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，运用了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的《春秋》笔法，也即用比较隐蔽和曲折的记叙方法，对只能奉称赞扬，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的汉

武帝和他的亲信，明里是褒奖，实际上是贬责。在时序的记述上，也是此处这样记，彼处又那样记，表面上看像有些矛盾，实则相互关连，所以读《史记》也须相互参照，多读些有关篇章，不能只读其一。现将我们的一些粗浅的看法写在下面，以请教于史学界的专家学者。

### 一、匈奴右贤王攻占河西

千里河西原为西戎族的居牧地，清代著名学者张澍辑注的《十三州志·居延泽》条目下说：“居延泽，古文以为流沙黑水，出张掖鸡出，亦名玄圃，有娀氏之女简狄，浴于玄丘之水，即此水也。”这就是说：早在五千年前的五帝时期，千里河西的黑河之滨，是西戎有娀部族居牧的地域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中说：“殷契，母曰简狄，有娀氏女，为帝喾次妃，三人行浴，见玄鸟坠其卵，简狄取吞之，因孕而生契。”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篇》中说：“有娀方将，帝立子生商。”汉郑玄在笺注时说：“禹敷土之时，有娀氏之国亦始大，有娀氏女吞燕卵而生契。”这些记述说明，居住在千里河西的西戎有娀部族，不只和中原的华胥族有频繁的往来，而且还和华胥族的首领有极其亲密的婚姻关系。随着与西戎族有血缘关系的大禹敷土治水，西戎有娀部族的国土也日渐扩大，并逐渐东移，最后与华胥族融合为一。

西戎东迁后，千里河西又为氐羌所据。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：“羌，西方牧羊人也。”《诗经·商颂·长发》篇中说：“昔有成汤，自彼氐羌，莫敢不来享，莫敢不来王。”《甘州府志·世纪》上篇中也说：“武王克纣后，西旅底贡厥獒（巨大的牧羊狗）。”这些事实说明，入居河西的氐羌族，同样和中原王朝有着亲密的往来，而且也为 1957 年玉门火烧

沟出土的羊头耳陶罐和带有牧犬的陶器所印证。其后氐羌东移，千里河西又为乌孙、月氏共居，并且以河西最大的内陆河——张掖黑河为界，月氏居东，乌孙居西。其后月氏逐渐强大，“有控弦之士十余万，”渡越黑河，打败乌孙，占据整个河西，并在黑河西岸建筑起驰名中外的昭武城。这时居于千里河西东北部的匈奴单于头曼，也将太子冒顿（音墨毒）质于在昭武的月氏王，继而又发兵攻打月氏，意欲借月氏王手除掉冒顿而立少子。冒顿闻讯后，偷骑快马逃归，头曼认为冒顿果敢英勇，即命他训练军兵。冒顿特地研制鸣镝（一种带声响的箭簇），趁机射杀其父头曼而自立为单于。当即东击东胡，西击月氏，南并楼烦、白羊、河南，成为雄居汉王朝北部边疆的草原大帝国。

西汉建立初期，汉高祖刘邦在白登被冒顿围困七日七夜后，用陈平计得脱，只好听从娄敬劝说，同匈奴缔结屈辱性的“和亲约”，但匈奴犯边侵扰并未停止。文帝刘恒四年（前176年），匈奴右贤王入侵河南地，汉文帝在命丞相灌婴备兵备战的同时致书冒顿，责匈奴违约入侵。冒顿还书汉文帝，把入侵河南的罪责推说是右贤王听信了部下的谗言，故罚“右贤王使至西方，求月氏击之。”匈奴右贤王遂率大军攻打在千里河西的月氏人<sup>[1]</sup>，杀月氏王，并以月氏王头颅骨为饮器，月氏人恐惧而西迁，沃野千里的河西，遂为右贤王的亲属浑邪王和休屠王所据。残忍暴戾，贪得无餍的匈奴诸王，利用河西丰富的物产和虏掠的各族农牧人民，在河西的一些城堡——尤其是黑河沿岸的昭武古城，开办生产兵器和生活用具的铁木工具制造厂，大批制造刀、矛、弓、箭等兵器和穹庐、车辆<sup>[2]</sup>等物资，进一步扩大掠夺战争。从而给汉王朝和边境各

族农牧民制造了更多、更大、更为深重的灾难，以致连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不无伤感地说：“朕饰子女以配单于，金币纹绣赂之甚厚，而单于待命加嫚，侵盗亡已，边境被害，朕甚悯焉[3]！”

## 二、霍去病两次西征

匈奴肆无忌惮地抢杀虏掠，边境人民——天水、陇西、北地、上郡、雁门、云中等六郡良家子，掀起私装从军抗击匈奴的热潮。汉武帝也顺应人民的要求，于元光二年(前133年)开始对匈奴进行反击。破格选用卫青、霍去病等娴熟弓马剑术的将领，其中霍去病的两次西征，是促成匈奴浑邪王归汉最直接、最重要的因素。

### (一) 霍去病第一次西征

霍去病河东平阳(今山西临汾)人，父亲霍长儒，是平阳侯曹寿家府的门官；母亲卫少儿，是汉武帝长姐平阳公主的贴身侍女；姑姑卫子夫，也是由平阳侯府入宫成为皇后的。霍去病乳名霍小，年九岁时曾伙同曹寿之子曹襄，在皇家御花园撞见汉武帝，微受风寒的汉武帝，被霍小撞翻落水的一块大石，惊吓出一身冷汗，绵延数日的风寒顿时全愈，当即高兴地说：“霍虽小，却能去病”，从而取名叫霍去病[4]。接着就由舅父卫青引荐，跟当时著名的大侠郭解，学习弓马剑术等武功[5]，年十八岁时即入宫为宫廷侍中。同年授骠姚校尉，率800精兵随卫大将军出征匈奴，杀敌2000余众，被封为冠军侯。元狩二年(前121年)春，汉武帝又授霍去病为骠骑将军，率精兵万骑，出陇西，由临津渡(在甘肃永静县境内)过黄河，走进天寒地冻、风雪弥漫的青海高原和祁连山区，用强攻速决战术，接连打败臣服于匈奴的西羌、月氏等五个小王国，战胜冰

雪严寒，翻越祁连山，到达千里河西的焉支山下。而后折转向东，在河西走廊东部的休屠城（在武威和民勤间的蔡其堡）附近，歼灭了休屠王主力；继而又在皋兰山下，同赶来增援的浑邪王部激战，俘获浑邪王子，收缴休屠王祭天金人，胜利返回长安。

司马迁对这次西征的记述是：“元狩二年春，以冠军侯为骠骑将军，将万骑，出陇西，有功。天子曰：骠骑将军率戎士，逾乌戾、讨速濮、涉狐奴，历五王国，辎重人众慑惧者弗取，冀获单于子，转战六日，过焉支山千余里，合短兵，杀折兰王，斩卢侯王，诛全甲，执浑邪王子及国相、都尉，首虏八千余级，收休屠王祭天金人……[6]。”这段引文中司马迁要记的只是：“以冠军侯为骠骑将军……有功”等18个字，接着在“天子曰”的后面，引用了汉武帝的一大段原话。聪明的读者一眼就会看出：汉武帝有意夸大卫皇后侄儿霍去病的英勇战功，尽管其中也有一些是真的，但夸大的成份仍历历在目。因为霍去病西征的时间是元狩二年春天，而且要跨越青海高原和祁连山区，据《西河旧事》中记述：“祁连山，有松柏五木，美水茂草，冬温夏凉、宜牧畜。”青海高原和祁连山区的夏季确实凉爽，冬季因季风受阻较缓，气温相对要暖和些，但祁连山区的春、秋，却是暴戾而阴冷的。据笔者在祁连山区二十多年的感受和一些零星的气象资料得知：立春过后，青海高原和祁连山区的风雪就肆虐起来了，过不了几天就有一场暴风雪，积雪往往在100多厘米左右（在生态未受破坏的西汉时期，积雪可能还要深一些）。那里的各族农牧民也只有熬过了春季，才算是渡过了一年中的难关。

“山近四时常见雪，地寒终岁不闻雷。”[7]

“两山阴逼天多暝，五月常飞六出花。”[8]

“未交八月先飞雪，春尽不睹桃李花。”[9]

历代诗人的这些诗句绝非有意夸张，而是客观现实的生动记录。何况从陇西（今临洮）到山丹的焉支山下，不下五六百公里；再加上青海高原和祁连山的冰雪及其陡峭难行，还有臣服匈奴的部族兵的阻拦，霍去病和他的一万精锐骑兵，即使是不吃不喝的钢人铁马，也不可能“转战六日，过焉支山千余里（平均每天的行程近200公里）。”至于说“冀获单于子”则更是奇谈，因为当时的单于和单于子，居住在龙城（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特一带），怎么能在祁连山中“冀获单于子”呢？由此可知，汉武帝的话起码有一半是假的。霍去病和他的一万骑兵，在青海高原、祁连山中和河西走廊东部一带的战斗，是比较顺利的，同时也是艰苦的，返回到长安已是夏初了。因为没有三个多月的时间，是夺取不了这场胜利的。

### （二）霍去病第二次西征：

霍去病胜利返回后，汉武帝非常高兴，在原封16000户的基础上，增封2000户，同时命霍去病和合骑侯公孙敖，率军数万，进行第二次西征。霍去病和公孙敖奉命后，进行了必要的休整和准备，于元狩二年盛夏离开长安，经咸阳、彬州（陕西彬县）、北地（甘肃庆阳）同公孙敖失散。霍去病率自己的一万精骑，过太原（今宁夏西海固地区），于朔方郡属窳浑县鸡鹿寨进入漠北，沿龙城古道抵达居延海，打败右贤王属下的一些小王。稍事休歇后，即沿着弱水北上，经盐泽（今高台盐池），到达黑河西岸的浑邪王居地——西城，同浑邪王进行了艰苦的拼杀。并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，歼灭了浑邪王主力，攻入祁连山，收服祁连山中的小月氏人，沿河西走廊东返长安。行程近3000公里，其中一半是沙漠戈壁，以每天30公里计，

需要 100 多天(将近四个月)。如前所述:祁连山区的秋季是阴冷的,隔三间五地下雨,河水也因而涨溢,霍去病由西向东行走,须经过讨赖河、临水河、红水河、梨园河、张掖河、山丹河、东大河、西营河、黄羊河、古浪河、庄浪河等十多条河流。其中张掖黑河夏秋间的流量为 700 - 1000 秒/立方米,如遇暴雨,黑河流量猛涨到 1400 ~ 2000 秒/立方米(在生态未受破坏的西汉时期,黑河洪峰可能还要大得多)。年轻气盛,不明黑河水情的霍去病,能会在黑河不遇到麻烦吗?张掖民间传说:霍去病率军攻占了浑邪王在黑河西岸的老巢——西城,狡滑的浑邪王当即率军从北门、西门、南门三面围住了西城,唯独留下了东门,而东门又紧贴着波涛汹涌的黑河,霍去病和万名汉军被困在西城,内无粮草,外无救兵,眼看就要全军覆灭。在一个阴冷的夜晚,忽而梦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走进军帐,引霍去病来到黑河沿岸,拔下头上的玉簪抛向黑河,顿时化作一座白玉拱桥。霍去病惊醒后出城观看,只见黑河结了冰,于是引着汉军悄悄渡过黑河,浑邪王发现后引数万铁骑追赶,不料冰桥塌陷,浑邪王的精兵被汹涌地河水淹没,勉强渡过黑河的,也被拦在岸边的汉军消灭 [10]。

也许有人以为这是神话传说,是不能用来做论据的。是的,神话传说是有人为的成份,但也恰如文史评论家裴斐所说:“这样作不是毫无道理,因为神话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。[11]”人们不也说:“野史可弥补正史的不足吗?”由此我们可以肯定,霍去病第二次西征曾经得到河西人民——特别是黑河沿岸人民的支援,才打败和歼灭浑邪王主力。还需说明的是:仙姑救汉军的故事还散见于河西宝卷、小曲和庙宇壁画中;诗人杨楷的《题仙

姑庙四首》之三中也说：

云中幻起白玉桥，黑水竟渡霍骠姚。

纵铸金人成底事，浑邪无计翊天骄。

可见霍去病在张掖黑河受阻，并且在张掖人民的支援下打败浑邪王，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。由此也可以推断：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返回长安，实际已是秋去冬来了，司马迁在记述这次战役的实情时说：“骠骑将军逾居延，至祁连山，捕首虏甚多”等十六个字。接着又在“天子曰”后面，引用了汉武帝的一大段原话：“骠骑将军逾居延，遂过小月氏，攻祁连山，得酋涂王，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，斩首虏三万二千级，获五王、五王母，单于阏氏、王子五十九人，相国、将军、当户、都尉六十余人，师大率减什三。”[12]读者同样会看出：汉武帝再次夸大霍去病的功绩，只字不提河西人民——特别是黑河沿岸人民对霍去病的支援。尽管皇帝的话是所谓“金科玉律”的圣旨，臣民们必须无条件地遵从，但由于包含的水分太多，仍不能完全相信。

### 三、浑邪王归汉

霍去病第一次西征，歼灭了休屠王主力，第二次西征又歼灭了浑邪王主力，确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创举，它不仅震撼了自被誉为是“天之骄子”的匈奴单于，同时对浑邪王归汉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，司马迁也一改先前只用寥寥数语的记述方法，对诸宿将失利，霍去病独胜以及浑邪王归汉，作了较为详细地记叙：“诸宿将所将士马亦不如骠骑。骠骑所将常选，然亦敢深入，常与壮骑先其大将军，军亦有天幸，未尝困绝也。而诸宿将常坐留落不遇，由是骠骑日益亲贵，比大将军。其秋，单于怒浑邪王

居西方，数为汉所破，亡数万人，欲召诛浑邪王；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，欲降汉，使人先遣使向边境要遮汉人，令报天子。边要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，得浑邪王使，即驰报以闻。天子闻之，恐其诈降袭边，乃令骠骑将军将兵以迎之。骠骑既渡河，与浑邪王众相望，浑邪王裨将见汉军而多不欲降者，颇遁去。骠骑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，斩其欲亡者八千人，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，尽将其众渡河，降者数万，号称十万。既至长安，天子所赏赐者数十巨万，封浑邪王万户，为漯阴侯，封其裨将呼毒尼为下靡侯，鹰庇为辉渠侯，禽离为河綦侯，大当户铜离为常乐侯……居顷之，乃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。[13]

这段引文中的“其秋”，司马迁未说明是元狩二年的其秋、还是元狩三年的其秋，一些没有到过青海高原、祁连山区和漠北古道的人们，既不知道霍去病西征的实际行程，也不知道在风雪祁连山和炎夏漠北道行军的实际艰辛，轻率地相信汉武帝刘彻的夸大不实之词，把这里的“其秋”认为是元狩二年的秋季，原不足为奇。但生活在祁连山下，对风雪祁连山和炎夏漠北道多少有所了解、并从事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人们，如果仍将浑邪王归汉的年月认为是元狩二年秋，那就近乎荒唐了。因为，匈奴单于居住的龙城距河西达 1000 多公里，在没有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，只靠骏马传递信息的西汉时期，不论是单于得知浑邪、休屠二王“数为汉所破，亡数万人”的信息：还是浑邪、休屠二王“谋降汉，使人先遣使向边境要遮汉人，令报天子”；更或是“天子恐其诈降袭边，乃令骠骑将军往迎之”以及“骠骑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，斩其欲亡者八千人。”等，都需要一定的时间，也就是说没有四五个月或是半年以上的时间，要了结上述事端是不可想象的。由此